

## 天命的宇宙—政治背景

班 大 为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sup>1</sup>？

中国早在公元前二千纪之初，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思想观念，其特点是自觉地依赖定期认真地观测天象获得指导<sup>2</sup>。不仅历法，而且还有任何神圣场所的正确朝向、宗教仪式的安排、每个季节该作的事全都要依靠国王特殊能力的表现，这种能力是皇权作为宇宙—巫术的角色所独有的。早期中国帝王的一个根本的特征是能够理解天道的节律并保持人间事物与天道变化相一致<sup>3</sup>。这提示我们，为什么早在公元前二千纪肉眼可见的五大行星不寻常的聚会与中国第一个王朝转化的巧合被认为使得向当时刚刚诞生的新王朝政权授予合法性这件事变得更加重要了。这样一种观念与大多数古代世界关于征兆的理论基础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事件 B 发生在事件 A 之后，所以事件 A 就是事件 B 的原因)的错误是一样的。在中国最早的事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殊的天文征兆对政治和军事行动产

---

<sup>1</sup> 《史记·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再版)，27，1342，下面所有正史的参考文献均指此系列。

<sup>2</sup> 这对于更早得多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的，这一点由公元前五千纪的墓葬的朝向和建筑的开门方向可以看出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沿岸的某些新石器时代墓葬的主要朝向都是一致的，这清楚地表明那时的人们已经在确定日出和日落方位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并且设计了一种确定四正——在有些时候还有四维——方位的方法。研究还显示出，属于仰韶早期的半坡遗址房屋的入口是有意朝向冬至后一个月左右下午太阳最热时的太阳方向的。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称这个相应的月份为“盖房月”；见卢央、邵望平：《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史前天文知识》，收入《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16。逆推计算表明，在公元前 4000 年的这个月份，太阳在星空中正处在战国和汉代称为营室“营造宫室”的星座的位置，若干个世纪之前的《诗经》中也称此星座为定星(定之方中)，并指出了此星座具有指示建筑计划的功能：“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于以日，作于楚室。”，见 Bernhard Karlgren: *The Book of Odes*(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0), 33。

<sup>3</sup> 徐复观也持相同的观点：“我们只需要想想巴比伦的天文成就，就不会觉得奇怪，在唐和虞的时代已经积累了一些关于天的秩序的知识，并且在政府中有专门的人传递这种知识，所以它没有受到朝代更替的影响。”《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有关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的问题》(台北：民主评论社，1961)，14。最近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王权的综合研究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关于帝王职能的宇宙化参见 Peter L.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Anchor Doubleday, 1990), 36。

生的实际影响所达到的程度。

中国的经学传统长期以来一直记着在极早的时代天文征兆与决定新王朝建立的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曾同时发生，本文的目的是要为此提供证据。

## 早期的天文观测极其与政治王朝的相互关系

过去 5000 年中五星最接近的两次聚会发生在公元前 1953 年 2 月下旬黎明之前和公元前 1059 年 5 月下旬黄昏时。“五步”的这两次格外接近的聚会一定在若干天之内吸引了全世界的甚至不经常的观测者，单是因为这样壮观的会合极为罕见就足以如此。<sup>4</sup>两次聚会都无疑被观察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被古代中国人记下来了，他们一定怀着惊奇的心情注视着这一现象并努力去理解它们的意义。还有一次发生在商初的 1576B.C.的奇特的五星“跳舞”被记下来，这是因为它与当时已经发生的华北政治地望的易主有关。大量的周代和汉代的文献中丰富的文字和年代证据提示我们，这些天象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显示着更高的神灵对新政权的合理性的认可，首先是 1953B.C.的夏王朝，继其后的是 1576B.C.的商王朝，再后是 1059B.C.的周王朝<sup>5</sup>。

我所注意的三次天象——1953B.C. 2 月在营室(宝瓶/双鱼)(图 1)，1576B.C.12 月在尾宿和箕宿(天蝎/人马)(图 2)，以及 1059 年 5 月在舆鬼(巨蟹)(图 3)的三次——是可考的最早的确实被中国人观察到、记下来并被解释为上天的意志的显示的行星天象。这些持续了几天甚至几星期的行星聚会一定给全世界的观察者都

---

<sup>4</sup> “五星聚于一舍”这句话通常被用于定义五星的聚合(例如，《史记·天官书》21, 1312)，必须把它理解为指五星聚于最大不超过经度 15° 的范围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用“反行一舍”来描述金星约 15° 的退行运动暗含了这一规定；参见席泽宗《马王堆帛书中的〈五星占〉》收入《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49。相反，黄一农 {“A Study of Five-Planet Conjunc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Early China* 15, [1990],97} 简单地假设 30° 为一舍，并进一步列出了相当数量的被认为符合这一定义的行星变化。在此基础上他研究了可观察到的五星聚会的罕见程度及其被人们宣扬的重要性。黄一农计算的结果是在公元以前的二千年中有二十四次五星聚会；然而，如果采用更小范围的 15° 的定义，那么实际上就只有四次符合标准，平均每 500 年有一次。而实际上，公元前 1953 年和 1059 年的两次壮丽的五星聚会中五大行星的接近程度更紧密，分别聚于 4° 和 7° 的范围之内。

<sup>5</sup> 参见 David W. Pankenier, “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Early China*, 7(1981-82), 2-37; “Mozi and the Date of Xia, Shang, and Zhou: A Research Note,” *Early China*, 9-10(1983-85),175-183; 班大为：《三天的天文观察和五行交替理论的起源》，《殷墟博物苑苑刊》1(1989)，183—188；班大为：《天命和五行交替理论中的占星学起源》，收入 Sarah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发现关于观测到这些天象的记录。<sup>6</sup>

表 1. 标志夏、商、周的建立的会合

	太阳	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宿
1953 年 2 月 26 日	321°	295°	295°	295°	292°	296°	营室(宝瓶/双鱼)
1576 年 12 月 20 日	255°	234°	279°	236°	234°	238°	尾—箕(天蝎/人马)
1059 年 5 月 28 日	56°	79°	82°	75°	77°	82°	舆鬼(巨蟹)

最近的一次，也是文献记载最好的一次，同时可能也是这三次五星聚会中最有说服力的一次是公元前 1059 年的聚会，发生在从柳宿(长蛇座  $\Delta$  星)延伸到轸宿(乌鸦座 B 星)的巨大的朱鸟的近西边(图 4)。《今本竹书纪年》对此事的记载在商代帝辛统治期，他的对手周文王推翻商统治之前几年，原文说：“五星聚于房有大赤乌集于周社。”<sup>7</sup>而且，《逸周书·小开》中独立记载了另一次天象，即一次月全食，书中具体地把那次月食定为周文王三十五年一月丙子。已经证明其日期的记载是正确的(公元前 1065 年 3 月 12 日)。<sup>8</sup>后一记录的准确性有力地证明

Allan 和王韬\*主编的《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说探源与思维模式》(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sup>6</sup> 关于这些古文明的人们肯定看到了此现象的证据, 参见 John D. Weir, *The Venus Tablets of\** (Istanbul: Nederlands Historisch 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1972), 其中对一片楔形文书进行了历史分析和年代确认, 这片文书保存着公元前二千纪前半页的二十年中对金星的连续的精确观测的记录。

<sup>7</sup>《墨子·非攻下》与此平行的叙述把此事扩展为：“赤乌衔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今本竹书纪年》说五星的聚会点是二十八宿的房宿(天蝎), 这无疑是在公元 281 年从一个被盗掘的古墓中得到已损坏的记着年代的竹片, 经晋武帝朝廷中的学者辛勤整理恢复原书之后插入文中的。公元前 1059 年的五星聚会实际上发生在紧靠朱鸟西边的巨蟹座(见图 2)。加入了天蝎座这个错误地点的原因班大为曾在“*Astronomical Dates*”7—8 中讨论过, 进一步的详细论述见“The Bamboo Annals Revisited: Problems of Method in Using the Chronicle as a Source for the Chronology of Early Zhou, Part 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5.2(1992), 279ff; 另见下面注 19。

<sup>8</sup> 见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0), 3.31。1981 年在中国和美国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这次月食的这一日期, 参见李昌颢主编:《中国天文学史》(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1), 21; Pankenier, “*Astronomical Dates*”, 7。与此阶段同时代的另一次重要的天文观测是周灭商时的一条可能是彗星初现的记录, 张钰哲的一项早期研究把这条记录认定为哈雷彗星, 并把它初现的时间定为 1057 年, 有几位中国学者采用这一说法把周灭商也定在那一年。后来利用中国历代记录到的所有对哈雷彗星位置的观测, 通过对经过引力摄动订正

了与朱鸟有关的刚好发生在七年之后的公元前 1059 年的五星聚会正是在周文王四十一年。<sup>9</sup>在很多天内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五星聚会都清楚地可见，正如“大赤乌”落在西北方向嘴里“衔”一块“圭”，我们现在认识到这是对行星形状的描述(图 3)。

从《诗经》、《竹书纪年》、《国语》、《史记》及其它文献中的历史记述中我们知道，文王立即进行了政治和军事活动，这明确地表露了他同商王决战的意图。但是文王没有活到亲眼目睹推翻商王朝，而于 1050 年死去，这一年是从他受命元年的 1058 年起算的第九年。直到公元前 1046 年木星再次回到朱鸟的嗥的位置时，文王的儿子及继承人武王才真正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战役，灭商战役最激烈的时候在公元前 1046 年 3 月 20 日(当时历法的二月甲子日)。在从周出师以及作战的时候，木星停留在鸟星附近 3° 到 4° 左右，长蛇座 A (A Hya) 星(七星宿一)，正像《国语·周语》所说的：“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我有周之分野”。<sup>10</sup>

对周灭商的前后事件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对那一段时间的年代的重建已经肯

---

之后的哈雷彗星的轨道进行更加缜密的分析，表明张钰哲的结论有约两年的误差。哈雷彗星实际上出现在公元前 1059 年末，距前面的 5 月份发生的宣布天命转移到文王的五星聚会迟七、八个月。见张钰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19.1(1978), 109—118; 特别是 Donald K. Yeomans 和江涛：“The Long Term Motion of Comet Halley”, *Mon. Not. R. Astr. Soc.* 197(1981),633-646; 还有 David W. Pankenier, “Early Chinese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The\*

<sup>9</sup> 《逸周书》和《竹书纪年》都坚称周文王死于他统治的五十年，受命之后九年，也是五星之兆出现之后九年；见 David W. Pankenier, “The Bamboo Annals Revisited: Problems of Method in Using the Chronicle as a Source for the Chronology of Early Zhou, Part 2: The Congruent Mandate Chronology in *Yi Zhou Shu*,”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55.3(1992), 498-510.

<sup>10</sup> 对距此次战役最近的前一次战役时木星运动的仔细研究表明，木星经过从 1048 年夏天以来稳定的向东顺行之后，到这年年末，突然停止向朱鸟  $\alpha$  Hya 的顺行，改变方向，开始逆行。这个意想不到的变化解释了为什么当周发动的第一次战役在周师已经到达黄河边上的盟津的时候却在最后的一刻撤退了。按照《周本纪》记载，正是在周率领的诸侯都说时机已到(“皆曰纣可伐也”)的时候，武王却对他的焦急的盟友说：“汝未知天命，未可”，从盟津班师回到渭河谷地的周的地界；见 Pankenier, “Astronomical Dates”, 15-16. 已散佚的周代著作《六韬》中有一段讲到了此次流产的战役，王逸对《天问》中“会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几句的注释中保存了此段话。，(参看 David Hawkes 译：“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楚辞补注》(四部备要版)，3.19a, \*\*关于《六韬》中对此次流产的战役的情况提供的线索见 Pankenier, “Astronomical Dates,” 30, n.79

定了古代的占星术传统，揭示了一些以前未被发现的事实，说明为什么周王朝的建立者宣称他们是遵天命行事并得到了天命。围绕这次给人异常深刻印象的五星之兆的一系列划时代的事件说明早期中国对下列事件的深刻信仰：上天以“天显”或“天威”形式显示智慧的；<sup>11</sup>周之兴起与作为吉兆的“凤凰”的出现之间存在着联系；在分野理论中由朱雀星座占据的天区与周王朝的命运有关；周代根据木星位置预言国家统治者的命运、战争胜负等的占星术实践；<sup>12</sup>以及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在早期帝国时代的征兆观念中，五星聚会与王朝更替具有必然的联系。

## 从一到三——从历史到“史前”

作为周得天命标志的那次五星聚会的年代被定为 1059B.C.，把这作为一个基点，有可能诠释出汉以前的文献中相似的叙述，如《墨子》中把以前已有的公元前二千纪中所有的与三个王朝建立有关的征兆都按年代顺序摘录出来。<sup>13</sup>《竹书纪年》中有关的年代把商得天命之年放在周得天命之年以前的 517 年，有了《竹书纪年》的帮助，在此年记录的五星的奇异行为“五星错行”就可以理解了，它

---

<sup>11</sup> 关于“天显”和“天威”见下面注 47(本文中节略——译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尚书》早期的一些篇章中的话，如《大诰》：“天明畏(威)弼我丕丕基”；《多方》：“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方罔堪顾之”；《多士》：“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罔顾于天显民祗”，参见下面注 65(本文中节略——译者)。早期的文献只是以隐晦的方式指出这些现象，这一点本身并不是什么怪事。John S. Justeson 在玛雅的经典文献中发现了与此相同的隐晦说法：“因为玛雅的天文学涉及到天神的活动，‘那些行为能对人间事物产生绝对影响的神’……所以已经开始认识到与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天文事件存在于实际上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经典文献中几乎从未提及这些关联：他们很少作出明确的占星术陈述，而只是提出相关的人间事物。在对这些结构组合进行阐释时，必须从各种各样的形式中引出这些没有直接说出的相关事件，并以数据加以证明”；见“*Ancient Maya Ethnoastronomy: An Overview of Hieroglyphic Sources*”，收入 A. F. Aveni 主编的 *World Archaeoastr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6. Justeson 也讨论了(第 104 页)特殊的天象(例如，木星和土星偶尔的静止不动)是如何被“公开地作为精英们作出决定的神圣的天命”用于制定人间事物的计划的，并得出结论：(第 115 页)“所以可能有关的天文现象通常没有从直接的文字叙述中反映出来；如果它们的出现被完全提出来了，它总是在相伴随的场景下。”

<sup>12</sup> 其它可见，例如《国语·晋语》中对后来称为晋文公的重耳反国的叙述(四部备要本)，10.11a-12a，其中按照木星正好十二年一周天的运行所作的预言具有关键作用，也许是周灭商这个先例的反射。

<sup>13</sup> 见 Pankenier, “Mozi and the Dates of Xia, Shang and Zhou”.

是对 1576 年秋季行星运行的描述，当时五星倒回到地平线上从黄昏到黎明再从黎明到黄昏都可见到五星。而且，《墨子》中对更早的在“玄宫”<sup>14</sup>对夏王朝的创立者赠与象征权力的玉璧的描述正与周王朝的瑞兆相呼应。这导致我们肯定中国在 5000 多年中一直对五星聚会进行观测，而 1953B.C.这一次——也是以超自然的力量授予玉璧这件事指代一次不寻常的行星现象(图 1)。<sup>15</sup>有了这点，与三代王朝更替有关的三次五星的聚会从数千年的隐晦形式中显露出来了。

我几次争辩过这些发现肯定了《竹书纪年》和《墨子》以及其它周代和汉代的著作在年代学和天文数据方面的历史真实性和源流的古老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后世这样的行星现象开始作为王朝天命转移的明确的证据。<sup>16</sup>这些发现还提出西周时期的“天命”观的滥觞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的商王朝建立之前已经存在，正如《尚书·多士》中说的：“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sup>17</sup>而且，

---

<sup>14</sup> 此点被周末的星占家石申确认为二十八宿中的营室；见《晋书·天文志》，11.301，书中保存了汉以前的石申的占星术术语。

<sup>15</sup> 见 Pankenier, “Mozi and the Date of Xia, Shang and Zhou”; 另见 R. B. Weitzel, “Clusters of Five Planets,” *Popular Astronomy* 53 (April, 1945), 159-161。

<sup>16</sup> 黄一农批评把行星的会合用于年代学研究，他选择了把这一类事件分开独立地对待的方法，实质上忽视了从对有记录的观测的检验中引出的重叠的历史和年代学的证据。黄一农却提供了他自己的未经检验的假设，即后来的文献叙述如果不是完全正确的话，一定是全部伪造的。这样，尽管在近一千年中接近程度最大的一次五星聚会从任何方面来讲都被证明发生在 1059B.C.，然而因为实际的五星聚会发生在 Cancer(巨蟹)而不是大多数后来的文献中说的 Scorpio(天蝎)，所以黄得出结论说对这次观测的所有的报告必须作为后来的伪造而抛弃。尽管黄承认《汉书》对作为刘邦“受命之符”的较不显著的 205B. C.的五星聚会记录的日期因为政治原因而经过篡改，但他也发现无法想象对 1059 年的事件的权威叙述只为适合汉代的五行理论就能够被改编。黄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先秦的权威性著作《墨子》中隐约指出了 1059 年的五星聚会的真实情形是发生在鸟星宿的鸟喙位置，他也无视如果有人只要意识到“房”这一位置是怎么回事——它是汉代按征兆理论进行修正的较晚的插入(关于这一点，见下面注 19)，那么从《竹书纪年》中有关这一段时间的相对年代就能够得到绝对的年代。把一系列涉及年代证明的数据减化成最简单的形式：如果有人单是在《竹书纪年》中记载的两次五星异常事件时间间隔的 509 年之间再加上 8 年来说明周兴起时五星聚会的真实位置是在 Cancer 而不是在 Scorpio，那么就得到了 517 年这个数字(也就是说，《竹书纪年》1580 - 1071 = 509; 509 + 8 = 517)，这正是我提请大家注意的真正的两次天文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也就是说，1576 - 1059 = 517)。现在的学术观点一致认为周灭殷发生在十一世纪中期，这里就没有从黄在他对当时情况的错误的再现中指出的各种各样的不重要的行星现象中进行筛选的余地了。江晓原(《天学真原》，115, 242)只是紧随黄一农之后否定关于五星聚会的早期记录的真实性的不对历史证据进行检验。江和黄都忽略了前引《逸周书·小开》中对文王三十五年丙子月食的记录的记载；见黄, “Five-Planet Conjunctions,” 96-112。

<sup>17</sup> 关于商代的证据，见 David N. Keightley, “Akatsuka Kiyoshi and the Culture of Early China: A Study in Historical Method,”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1(1982), 272,296, Keightley

在 1576 和 1059 年的两次行星现象之间的 517 年(准确地说是 516.33 年)肯定了孟子(公元前四世纪)关于从成汤到文王和从文王到孔子(551—479B.C.)之间各经过“五百有余岁”的断言是确切的,也坚定了他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信念<sup>18</sup>。这样就不奇怪,至少从孔子时代以来,很少有人怀疑天将在某个时刻介入,举出一个新圣王以及新王朝的缔造者,结束战国时代的政治混乱和连绵不断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汉代中期的讖纬也含有对相同的天象观测的可辨别出的叙述,尽管有一条规律,即它们通常存在着为了与当时的征兆观念相一致而作伪的痕迹。<sup>19</sup>虽然《史记》和《汉书》屡次提及 205B.C.的五星之兆,但其中任

---

在此得到的结论是:“……Akatsuka 察觉到对公正的帝的祭祀与对偏袒的祖先神的祭祀之间存在着紧张,这个问题最后由西周时把帝(或天)放在第一位而得到解决……他还提出(在殷人看来)上帝不是把他的帮助限于殷人……因此任何人都可能真正得到“帝令”,“帝令”能使作物减产和敌人对商发动进攻,这是周“天命”思想的雏形,……、我相信 Akatsuka 在这些问题上是正确的。”

<sup>18</sup> Derk Bodde 在其 *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123) 中特别提到李约瑟“指出,木星、土星和火星每 516.33 年会合一次,他认为这可能是孟子这一信念的基础”;见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3,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408。实际上在这个观点上李约瑟只是跟在 Herbert Chatley 的后面(见 Pankenier, “Astronomical Dates,” 24), 但是在此值得提出的是,尽管 Bodde 和李约瑟都没有明确指出,但在西周时代中国人能够推测出存在 517 年这个周期,唯一的途径应当是公元前 1576 和 1059 年的两次五星聚会都被观测到了并像《竹书纪年》这样按照年代记录下来,后世从此记录能够推出它们之间相对的年代关系。公元前 543 年(据推测,当时孔子很年轻)11 月/12 月有一次可能被观测到但是较不显著的五星聚会,也在 517 年的序列之中,我没有听说对此有记录。这个周期中的下一个是公元前 26 年 4 月,这次被观察到了并记录在《汉书》中,但只是作为土星、木星、火星三星的聚合(见《汉书》, 3.1310),因为这一次与前三次的情形不同,水星和金星离开有一段距离。

<sup>19</sup> 在此处引用一个特别惊人的例子是桓谭(卒于公元 28 年)《新论》中关于文王得天命符瑞的记述(引自《太平御览》84.5b):

其后有凤凰衔书于郊。文王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乃作凤凰之歌曰翼翼翔翔 \*凤兮衔书来游以命昌兮,瞻天案图殷将亡兮苍苍皓天始有萌兮,五神连精合谋房兮。

尽管明显作于五星聚会被认定为房宿的较晚的时代,对于五精的确认却是不错的。在汉代,对汉德问题的辩论得到的一个结果是,周德从“火”变为“木”;这样,从汉中期的纬书开始,周代的五星聚会位置被报告为“房”;参见,例如《文选》(59.28),“三仁去国五曜入房”的注解:

《春秋元命苞》曰:殷纣之时五星聚房。房者苍神之精,周据而兴。

另外,在汉代最后一个皇帝献帝于 220A.D.逊位于曹丕时,在此前后的大量的官方奏折引用的天文符瑞中也可能有对夏商更迭之际五星错行的特别暗指;见《三国志》2.74,其中“五纬错行”被列入汉朝天命已经转移到新的王朝的征兆之中。关于《易林》中提到的与天命相

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特别提到在此之前与三代期间天命转移有关的五星聚会，<sup>20</sup>考虑到当时异常天象在人们思想中的重要性，这种情形是很令人惊奇的。所以，很明显，纬书和其它周末和汉代的文献保存了标准的正史文献中描述不足的上古传统的遗迹。它们之所以存在下来可能应该归因于它们被转变为与上古天神(天或上帝)信仰有关的人人皆知的星宿的一部分，这些天神能通过天空展示“象”或“文”来给人神秘的启示，干预人间事物。

过去，尽管有胡厚宣<sup>21</sup>、徐复观、顾颉刚<sup>22</sup>以及其他人的开创性的工作，但是，关于公元前二千纪像这样的宗教和宇宙论观念的具体证据相对来说太少，这使得我上面提出的一些断言看起来太大了。特别是声言对 1953B.C.的五星聚会的记载能够在中国考古学上出现文字以前相传若干个世纪，乍看起来似乎需要一种信念的飞跃。<sup>23</sup>应该承认，从夏到商早期缺乏当时写下的记录这一事实向编史学提出了难题，但是这不是不可越过的。中国的文字可能比最早的甲骨文要早相当长的时间：甲骨文字的成熟性本身就告诉我们足够多了。我们还从考古学上的证据和铭文方面的证据（例如，“典”和“册”在甲骨文字中的字形）知道，商代时中国人用毛笔和墨水在竹和木一类容易腐烂而没有保存下来的材料上写字。还有，在《尚书》、《左传》以及其它地方有明晰的证据证明，夏代的某些案卷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还能够查到，还有确实的学术结论证明文字出现之前的口头相传是真实可靠的。然而，下面我打算审查一下通往三代期间的宇宙观和宗教思想的其它途径，以期建立起某种当时进行天文观测的宇宙—政治背景。最近，有关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早期的宇宙观的证据以及宗教史研究在比较和理论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这可能会帮助我们在历史编年中遇到的令人困惑的鸿沟之间架设桥梁。

---

联系的五精，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收入《古史辨》卷3(台北重印，无日期)，27，34。

<sup>20</sup> 关于作为汉得天命之征兆的公元前 205 年五星在 Gemini/Cancer(双子/巨蟹)的聚会，见《史记》27.1348 以及 89.2581，并见《汉书》26.1301 以及 36.1964。

<sup>21</sup> 胡厚宣：《殷代的天神崇拜》，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1—29。

<sup>22</sup> 见顾颉刚：《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入《古史辨》卷5，425。

<sup>23</sup> 关于这里涉及到的一些方法论的问题，见 Noel Barnard, “Astronomical Data from Ancient Chinese Records: The Requirement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East Asian History* 6 (Memorial Volume for Prof. C. P. Fitzgerald: December 1993), 47-74, 特别是 69—72; 还有 Barnard, “A Discusant’s Thought,” 为 AAS panel “Astrology and Chronology in Shang and

## “五行”关系的早期形式

自然与人类世界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关联特别存在于与季节循环和昼夜变化有关的方面，虽然这样的思想无疑是自发地产生于远古时代，<sup>24</sup>但是政治实体的崛起和衰亡与一系列自然的力量之间的联系决非也是一样不证自明的。因此，看起来总是这样：大多数周代晚期和汉代的文献中都详细阐述的五行“相生”规律只是存在于更深刻的背景之下的一种解释模式，因为它与从春天开始的季节变化相对应(土在较晚的时候被确认为中心)，在此过程中自然的力量显示它们的影响力。<sup>25</sup>另一方面，按照邹衍(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及战国时代阴阳家的思辨性的理论，五种基本的宇宙力量的往复循环直接影响王朝的命运，这些理论看起来只是纯粹的思辨，而没有事实的、历史的或其它方面的深刻依据。

但是，三颗显著的行星分别在四象中连续的三个——天空中的冬天、秋天、夏天三个“宫”——中相继被观测到，天降天命于三个相继的朝代的缔造者，以及文献中关于他们与三种特殊的颜色和物质(黑/水，白/金，红/火)的联系，这些固定的关系的发现不可拒绝地证明，对宇宙论的思索与王朝政治是密切相联系的。曾被《墨子》以及其他人明确地引述过的自然力的相互联系的这种顺序只有通过五星发生变化时在天空所处实际位置的当时的观测才能得到；《论语》、《礼记·檀弓》、<sup>26</sup>《春秋繁露》、<sup>27</sup>《史记》的“本纪”、以及各种各样的汉

---

Zhou”准备的，1995年4月8日。

<sup>24</sup> 前面(注2)我引用过一个在确定坟墓和房屋的朝向中敏锐地意识到方位的例子。进一步的讨论，见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二卷,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261; 以及徐复观:《阴阳五行观念》第12页:“古代不论在哪里，地上的显著现象都被用于解释天文现象。水与火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这二者的应用又是互相不可分的。把这二者用于天文学上说明相似的天象可能非常古老。”\*

<sup>25</sup> 早期竺可桢曾证明，天宫跨度的巨大差异恰好符合其相应的季节的长短，所以在天空中划分出天宫一定紧随在人们分清季节之后；见《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思想与时代月刊》34(1944)，12。关于商代和更早的时代的火历以及把大火星( $\alpha$  Sco)作为基本的季节标志，见庞朴:《火历初谈\*》《社会科学战线》1978，4，131—137；I. Icsedy *et al.*, “Antares Year in Ancient China,” in *World Archaeoastronomy*, 183-186; 冯时:《殷历岁首研究》，《考古学报》1990.1，19—42，特别是其中的28页；还有《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9.2(1990)，109页；《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3，55。

<sup>26</sup> 《郊特牲》、《明堂位》也都提到过个别的正色，然而最完整的陈述在《礼记·檀弓上》；

代纬书都说夏、商、周三代曾采用过“正色”，上述自然力的相互联系的顺序正是三代的正色所反映的顺序。

在三种颜色与三代之间的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有关的天文学上的精确性几乎不可能是出自偶然这一事实，而且还有它提示我们的关于公元前二千纪的宇宙观的实质及其与很多世纪以后的大众传统的连续性。很多与天命征兆有关的传统在周代晚期和汉代第一次以文字形式出现，我们对此时期的天文知识状况相当熟悉，我们确切地知道这时对如此复杂的行星现象不可能以任何精度逆推出来。所以，结论只能是，周代的叙述中包含的基本概念和术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反映了天文观测最初发生时的宇宙知识水平。<sup>28</sup>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在三代的宇宙论与后世的五行说理论化之间存在着基本观念的连续性，自从1987年濮阳仰韶文化地点的发现以及其它一些惊人的发现以来，这种观点开始显得不那么离奇了。<sup>29</sup>

---

见《十三经注疏》(台北重印，\* 印书馆，没有日期)，6.12。

<sup>27</sup>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台北重印，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7.10b。在对与商有关的周代传统的另一个更有力的确证中，裘锡圭证明传统的认为在礼仪活动中商偏爱白色是准确无误的；见《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殷墟博物苑苑刊》I(1989)，70—72。最近，李零得出相似的结论“\*”；见《式图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第一部分，《九州学刊》4.1(1991)，22。

<sup>28</sup> 以前徐复观曾提出过五行起源于天文的可能性，然而他认为，在远古天文概念和后来的五行理论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见徐复观：《阴阳五行观念》，12。

<sup>29</sup> 在现在著名的濮阳墓葬中，墓主看来是萨满或社会地位很高的宗教人物，用蚌壳精心摆成了虎和龙的原型形象，准确地放在尸体的天文东方和西方，尸体沿南北轴的方向放置。对这一发现的最新的估计，见David N. Keightley, “Chinese Religions-The State of the Field, Part I, Neolithic and Shang Period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1 {February 1995}, 130。关于这一发现的天文学意义的推测，见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52—60，69；特别是他的《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108—118。从宇宙观角度来看同样另人惊奇的是，1987年在安徽含山凌家滩一座公元前2500年的新石器时代古墓中发现的玉龟和刻文玉片；见陈久金和张敬国：《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4期，14—17。这一惊人的发现肯定了龟作为宇宙的神圣的象征形象的古老角色，关于此点，见Sarah Allan,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Albany: SUNY Press, 1991)。这片发现于龟的背甲与腹甲之间的长方形玉片上刻阴文图案，图形最像一个罗盘的刻划(不用说，它不是)。这提示着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中心，从这里象外面四正四维八个方向放射影响这种观念的形成是极早的。有关这个图案与后来的宇宙观念及人工制造物之间的联系的详细讨论，见李学勤，“A Neolithic Jade Plaque and Ancient Chinese Cosmolog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故宫通讯英文双月刊 27.5-6(Nov/Dec 1992-Jan/Feb 1993), 1-8。冯时还研究了公元前3000年的红山文化的石祭坛，得到的结论是它们是用来向天神和/或向日月这样的天体献祭的；见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北方文物》33.1(1993)，9

现在一般认为，从夏到商，以及从商到周的王朝代换标志着盟主地位在或多或少共存的政体之间的成功转移。在此过程中，河南中部作为文化和政治中心，其重要性通过连续被定为那一地区礼仪和文明统治的所在地而得到显示，首先是灭夏以后从东方进入的商，然后是在华夏西部边陲崛起走向顶峰的周。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的时候，由于宇宙观和实际的原因，邻近黄河与洛河会合处的古代夏的中心地的强大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此前有商从他们近山东半岛及东部沿海的故乡迁移过来，至此周学着商的样板，从在名义上是商统治地的最西边的渭河谷地移到了接近现在洛阳的一个新的王朝都城。通过灭商以后就立即做这件事并把这件事向天报告，周朝最早的统治者们坚定了他们在原来商领土的中心地统治文明世界的愿望。由此，周通过在古代夏民族的世居地来统治天下开始合法化并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声称是源于夏族并继承了夏文化。

为了争取得到天对新王朝的保佑，周武王选择在一个叫做“天室”的地点来举行最神圣的即位告祭仪式，“天室”指嵩山，为“中岳”，它耸立于洛阳东南的黄土平原上。<sup>30</sup>这个位置被认为与天极有关，天上住着天神，天官都绕着天极转。<sup>31</sup>当“中国”这个词第一次在西周早期铭文中表述清楚时，我们把这作为商代关于他们居住地的中心既是宇宙的中心又是世界的自然中心的思想的继续。<sup>32</sup>

---

-17; 田昌五: "On the Legends of Yao, Shun and Y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3 (1988), 21-68.

<sup>30</sup> 林云\*在最近提交给西周文明国际会议(西安, 1993年7月)的论文中提出, 武王时代的天亡簋上的铭文“王有大礼, 王凡四方, 王祀于天(大)室, 降”是指武王在牧野之战败商以后回来的路上在嵩山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封禅。《左传》(昭4)中也提到过天室指嵩山。这段铭文进一步证实了《逸周书·度邑》和《史记·周本纪》中对此事的叙述; 见林云\*《〈天亡簋〉“祀于天室”新解》。

<sup>31</sup> 司马迁说: “斗为帝车, 运于中央, 临制四乡。分阴阳, 建四时, 均五行, 移节度, 定诸纪”, 这意指着从天极放射出超自然的影响力; 见《天官书》, 27.1291; 参看 John S. Major,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 (Albany, SUNY Press, 1993), 107. 中国天文学在其开端就确立了天极—赤道方向, 并且从初期开始的宇宙论中就有明显的天地对应的思想, 从这些方面考虑, 很可能这种关于高级的神灵的居住地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然, 通过与天极类比, 理想的世俗统治者被想象成只是在他的位置上面南而坐, 他的官员们围绕着他执行他的命令。这就是孔子在《论语》(2/2/1)中在世俗统治者与天极之间作的著名的比喻的基础: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sup>32</sup> 见 Chu-yun Hsu and Katheryn M. Linduff, *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98; 关于商代的宇宙观, 见 Sarah Allan,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以及 David N. Keightley 在 “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The Imposition of World Order in Late

这样，在最早的记载国家对天的祭典的周代铭文中提到了从中岳的制高点巡视四正方向，这表明周王所做的最早的公事之一是隆重地确立周朝统治对于四方的正统地位。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这个古代的观念，即把中国人的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宇宙整体、皇帝的神圣能力从中心理想地越过这个整体向四方延伸——就像天上的统治者一样，这一观念我们从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熟悉了。

虽然一般认为，在礼仪和宇宙观问题上颜色的一致是在公元前 770 年当秦襄公取得了周的保护者的地位后开始祭祀“白帝”才出现，<sup>33</sup>尽管李约瑟对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就把天区划分为五宫持怀疑态度，<sup>34</sup>但是，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指示着在三代期间存在着这样的符号上的相互关系，正如《尚书》中《洪范》和《皋陶谟》两篇所提示的。在此也许我们对后世五行之“德”与政治命运的循环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有了一个较少思辨的基础：宇宙的德、超越现世的力量德的和王朝的德不是由后来的事件决定的，而是在每个王朝开始“占星术式地”建立起来的。

A.C. Graham 尽管对早在公元前二千纪五种物质与五个过程已经是与颜色相关的主要因素这一点表示怀疑，他还是强调了识别出隐藏的各种现象之间经验主义的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的联系的思想总是试图说明这些关系，“从现在的观点看，中国的第一科学是发现现象之间的重要联系，但只是在与阴阳相应的事物之间确实存在着平行的、偶然的的关系的时候，或在与季节或方向存在着偶然的的关系的时候，方向与季节是五行的有力的两个相关物。”<sup>35</sup>我争辩的是，正是这样的关系存在于行星现象、四正方向、观测季节以及相应的颜色之间。举例来说，的 1065 年的月全食和 1059 年的五星聚会都发生在朱鸟的位置，也都被直接应用于

---

Shang Divination”(即将出版)中对“中心性”的讨论；关于汉代的轴心原理，见 John S. Major,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37. 关于人类学上的考察，比较 Clifford Geertz 对传统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组织的“典型中心”模式的讨论，“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收入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22-223.

<sup>33</sup> 《史记·封禅书》，28.1358。又见 Max Kaltenmark,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a of the Ts’in and the Han,” *Diogenes* 34(1961), 20ff.

<sup>34</sup>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2, 246.

<sup>35</sup> 见 A.C. Graham, *Disputer of the Tao* (LaSalle, IL: Open Court, 1989), 346. 正如 Karl Lowith 指出的，古代人相信未来的事件可以通过像占卜或星占这样的特殊方法而预知，这种信仰蕴含着一个预先的假定，即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注定了。所以，占卜和以异常天象为对象的占星术就是提早“阅读”吉凶之兆的方法，把超自然力量的意向作为已经完成了的事实或知识来“阅读”。见 Karl Lowith, *Meaning in History: The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

周朝的运势之中。在前例中征兆被认为是王权转移的象征，所以周武王看到了这次“不和时宜的”月食后要求他的大臣说：“食不时，……汝开后嗣谋。”这说明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这块特殊的天区在占星术上已经与周相连了，正如大火已经与商的命运相连一样。<sup>36</sup>

如果后世占星术分野图式的这种早期形式在此时已经存在，那么这当然有助于我们公正地评价历史上关于在周灭商之前帝辛的一些近臣谋士都弃帝辛而走，以及 1046 年的牧野之战中商王的军队也不战而逃的记载，因为在整个商朝统辖范围内，都可以看到 1059 年 5 月的五星之兆发生的位置以及八个月以后不吉祥的哈雷彗星出现在大火附近。周文王从 1058 年得天命以来从事的明显带有煽动性的活动对商王的权威构成直接的挑战，这表明他极力利用他在军事方面和心理方面的优势。<sup>37</sup>所以《尚书·大诰》中引周公说：

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呜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这样的语言不能再打折扣认为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按照古代人“的理解，与他们有关的事的发生是由超自然的力量，神，以及魔鬼引起的……按照古代人对事物的经验和记录，神正是赋予事物以联系性和意义的原因网络上的结点。”<sup>38</sup>

我们知道，新生的宇宙论有一些类似于它在三代期间被应用于王朝更替那样的历史基础，我们还知道在周晚期和汉代经过检验有效的流行的占星术传统具有

---

<sup>36</sup> 让我们看一下《左传》(襄 9)中关于阚伯和实沈的神话：

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朱\*，以出内火。是故朱\*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阚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阚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还有《国语·晋语》中的宣言：

大火阚伯之星也实纪商人。

参见 Pankenier: “Astronomical Dates,” 7,12.

<sup>37</sup> 例如，按照江晓原所说，周文王在 1051 年他得天命的第八年急急忙忙地建造用于天文观测的带有礼仪性质的灵台就是这样一次反叛的活动，因为这在商代已经是皇家的特权；见《天文、巫咸、灵台——天文星占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56。

<sup>38</sup> 见 Thorkild Jacobsen, “The Historian and the Sumerian Go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4.2(1994), 46. Jacksen 的讨论虽然是针对古代苏美尔人的宗教思想，但是与商和周代早期的观念世界完全一致。关于这种体会世界和因果关系的方法，Jacksen 给予一个称谓“经验的神权化方式”(theoratic mode of experiencing)。当然，这种经验的方式的一个本质方面是对占卜的有效性的信赖。正如 Karl Lowith 已经指出的：把我们与古代人分开的最深的鸿沟是，他们相信，或者是通过理性的推论，或者是通过流行的请示神谕和占卜，

强大的生命力，这样，邹衍的第一科学的理论化为他在战国统治者的朝廷中赢得了这么多表示赞同的倾听就不像以前认为的那么令人吃惊了。无疑，在邹衍这个案例中，巨大的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他的精英听众的思想中，他的综合大大提高了本来有些缺乏系统化的流行的关于天的宗教信仰的分类的地位。传统的碎块在他的富有生气的理论中一旦被结合到一起，对循环的合理的暗示就变得不证自明了。<sup>39</sup>

在周王朝的缔造者首先表述了天命的理论近一千年之后，司马迁用简洁的语言恢复了被遗忘的五行宇宙观与这种理论的占星术起源之间的关系：

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

以前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段话的重要性，但是对司马迁来说，至少天象与人间事物的联系看起来是不证自明的，所以他说：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官，地则有州域。<sup>40</sup>

这样，看起来五行相关的思想最后被吸收到汉代的理论中以及汉代显赫巨富的反叛运动都可以在极大的程度上归因于由三代星占家和宇宙论者提出的相同的标志。<sup>41</sup>

---

预知未来是可能的；而我們不相信。”见他的 *Meaning in History*, 10。

<sup>39</sup> 也见徐复观：《阴阳五行观念》，52：\* “邹衍的五德相继的理论代表着原始宗教以另一种形式的续存。依次变化的五行之德是天命的具体化。”

<sup>40</sup> 见《史记》，27，1321，1342。与天上五星有关的现象标志着地上与之相对应的五行的运动。所以，上述司马迁所说的“易行”一定是指“五行力量的变易”，直接与五行理论相关。“无德”在此上下文中无疑是指和当时占优势的“德”不一致的行为。

<sup>41</sup> 也见李零最近对古代宇宙论研究的结论：“这种学说在战国秦汉之际臻于极盛，虽然遇有新的思想契机，也包含了许多填枝加叶，整齐化和系统化的工作，但他绝不是邹衍一派的迂怪之谈所能涵盖，而是由大批的“日者”“案往旧造说”，取材远古，以原始思维做背景，从非常古老的源头顺流直下。”李零：《式图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第二部分，《九州学刊》4.1(1991)，75。对比 John Major 把《淮南子》中宇宙论的一章作为黄老学派主要思想的著作所作的讨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转化成政治力量，”“宇宙起源说、宇宙结构说、天文学、历法星占学以及宇宙论中的其它方面组成了一个没有缝隙的网，统治者如果忘记了其原理，一定是到了将要覆亡的地步。……汉初黄老学派的可信性可能部分地由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被置于中国文明奠基之时就出现的普遍信仰的假设之上。”见 Major,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43.

---

(徐凤先译)